



我的路 我的夢 我的心

傑出校友／沈柏青 教授

光陰如梭，日月飛逝，昨日少年騎竹馬，今朝化作白頭翁。如今且每天忙進忙出，實有違背我生涯規畫的初衷。「富在知足，貴在知退」。在屆齡退休之後，還蒙母校校方及各位同仁的提攜，擔任校長室諮詢委員，了解學校日日進步的概況。並受聘擔任兼任教授與年輕學弟妹有良好雙向溝通的機會，同時亦兼任課程與學程委員會委員及杜聰明教授教育基金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心情無他，只是想以義工的心情報答學校多年來教誨與支持而已。

回顧當年，是台灣經濟尚未起飛的農業社會，實習醫師期間(1960-1961)深思畢業之後將要何去何從。家父是一台南縣下的內科開業醫師，當時就診病人多以農民為主，是一個寄生蟲猖獗的年代。每天看到父親都以顯微鏡檢查寄生蟲，使我對寄生蟲產生好奇(家父因長期投入寄生蟲之防治工作，1992年日本文豪司馬遼太郎訪台，在其台灣紀行一書中p.225~237詳加介紹)。尤其是謝獻臣教授的寄生蟲課與實習，印象特別深刻並感到特別濃厚的興趣，再加上五年級時曾由翁廷銓教授給我們上了一堂外科寄生蟲學，內容以寄生蟲所引發的腸阻塞及膽道阻塞為主題。因此在畢業前夕，曾經拜訪謝教授，將來是否可以投靠門下，選擇寄生蟲科為終身研究的志業。但當時的謝教授說非常歡迎，也非常誠懇要我必須思考已有第一屆的陳瑩霖學長要來，你們相差一屆，對將來的發展一定會有所限制與困難，因此一再地思考才改變了方向，選擇投入由郭宗波教授領導的外科。也是這一大轉折，改變了我的路也改變了我的夢與我的心。

當年是大外科的時代，沒有像現在有蓬勃發展的次專科，因此在與內人(剛從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所畢業回國)結婚後，乃決定前往日本。得到日本九州大學教授會通過接受我醫學研究所的入學，並要求我在台北日本大使館接受日文程度檢定，包括聽、說、讀以及作文能力測驗，當時的聽力考試至今仍影響我一生的重要啟示是「一個人有三個影像」：你個人如何看自己，他人如何看你自己，上天如何看你自己。使我至今行事、談吐都非常的用心與低調以維持良好的形象。

1960年代日本已進入次專科時代，第一屆林永哲學長在日本九州大學接受心臟外科的次專科訓練。因此我乃選擇進入九大60年來標榜的肝膽

胰外科，因為這也與寄生蟲有關，奠定了我回國之後在高醫創立全台第一所的肝膽胰外科。高醫的可貴之處在於校友多方的支援與互相協助，在我報考日本醫師執照之際，很多比我早到日本的高醫校友提供日本醫師考試的參考資料，使我毫無困難的通過日本醫師執照考試。而後在國內也因校友之支持擔任全國醫師會常務理事及台灣醫學會之國際事務召集委員，因而得以造訪各國擴大視野。當年回國之際，正值台灣國際關係動盪，與日本斷交、被聯合國驅逐，多數的親朋好友都反對回到前途未明的台灣。當時的楊振忠院長到九大訪問二次，與我懇談，提及是否應該回來？並有機會與台大魏火曜院長(曾任高醫院長)深談，提起回來可能是可以選擇的一途。楊院長也說既然要回來則必須把課教好，所以至今上課非常用心。而且上課不僅讓我與年輕學弟妹有接觸的機會，也可以鞭策自己希望成為一位良師。同時也曾向陳振武院長請示，他表示自己不是高醫校友都願意為高醫打拼，而你自己是高醫人不願為高醫貢獻嗎？強化了毅然決定回國為母校服務的動力。特別在20年前恩師陳章義教授出任附院院長之前夕，要我出任副院長輔佐院務。但自認學疏才淺，另一方面臨床工作又繁忙，雖一再推辭，但陳教授且說將由師母陪同到寒舍懇求等等。對恩師的熱情與用心提攜後輩，至今感激不已，也因而對日後之教學醫院評鑑工作，借此行政經驗得以發揮。

回顧一生，已過古稀之年回想當年陳啟川董事長，他說若有人問起你是哪一所學校畢業的，應很驕傲的回答「高醫」。同時憶及學生時代陳啟川董事長(日本慶應大學校友)曾陪同慶應大學醫學部部長草間良雄教授演講，提到慶應大學的立校精神「獨立，自尊」，高醫多年來在董事會、校長全體師生的努力之下，已達此境界。杜聰明創校院長「樂學至上」，「研究第一」應當也是我們高醫人持續堅持的精神。無論時代如何改變，環境如何變遷，潮流如何衝擊，高醫對我是無法切割的存在，我的路，我的夢，我的心，只有高醫是永遠的。特別在今年由多位同仁的推薦之下，被推舉為傑出校友，實為無上之光榮，自覺在有生之年更應為高醫更盡一份棉薄之力，更希望各位董事師長及校友繼續賜予指導與鞭策。